



為喝咖啡而來，但我久久走不到咖啡桌邊，貼在水東院子進門處牆上的兩張說明，把飛機上的電影和這棟老旅店連接起來。

□朵拉

下車的時候遇見大陽雨，不大，於是不帶傘。南洋人習慣不帶傘。因為老城很多騎樓式房子。

惠州老街亦是騎樓街，下雨根本不用發愁。

天氣稍涼，但不算冷，L說逛過老馬路去喝咖啡，喜歡每天一杯咖啡的我，多日無咖啡，這時帶著熱咖啡的美好期待在老街閒逛。

邊走邊看，腳步徐緩，突然遇到一條很瘦的，我轉過頭問：「這也算是一條街嗎？」

我一邊探頭往裏看，一邊在想，是否可以用牙籤來形容？「惠州市惠城區橋東上塘街一巷。」惠州的陌生遊客對惠州一無所知，幸好新識的年輕小友L帶來歷史系的B老師，歷史人物和故事便跟著我們一起走。但這巷子瘦得容不得三個人一起並肩進去。

瘦巷子固然稀奇，卻非大誘惑，吸引我步上台階的是「林振雄」。牆上牌子畫個箭號寫「林振雄故居」。我跟箭號走。只經過房子外頭，沒進去參觀。事先沒安排，後來已經明白，旅遊這回事不必太刻意，一切看機緣。房子外牆有牌子寫「上塘街一巷3號」，下邊的說明是「林振雄故居和簡介」。大門橫披「迎春接福」，「迎春」中間貼一張符，直長形，把「接福」分開，對聯是「福壽康寧滿？」，最底下一字被看起來像三角梅的葉子遮去，另一邊「榮華富貴盈門喜」，全是繁體字。

誰是林振雄？大街巷子口既然釘着林故居牌子，定是惠州名人。走老街為看歷史，遇見歷史名人很自然，生活在風起雲湧、波譎浪詭的大時代裏的歷史人物，不論如何坎坷曲折，超越時空之後，在B的口裏僅只幾句話便道盡一生。「少時聰穎過人，抱負遠大。生於世襲官紳家庭，讀書時認為非軍事不可救中國，報考軍校成績優異，後獲清政府保送東渡日本學習軍事。在日本曾與蔣介石同學，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，從此投身革命事業。」

辛亥革命起義成功，林振雄出任南京臨

時政府下屬團長。聽到這裏我趕緊插嘴：「廣州和武昌起義，是孫中山先生在我的出生地檳城策劃的，所以叫庇能會議，庇能是檳城PENANG的英文音譯。」這樣一說，感覺惠州和檳城靠得比較近了。

林後來任雲南陸軍講武堂教官，一連串出色表現，使他在黃埔軍校成立時，被委任管理部主任。一心為國為民，因而受到政府重用，官職越升越高，身負國民政府國防部中將高級參謀、中央軍法處處長、兼國民政府國防建築委員會主任等重任，後來因政見和蔣介石嚴重分歧，1937年南京淪陷前，他返回惠州。1938年10月，日軍打到惠州，林受命統轄省防軍警備團並組織廣東東江數路民團予以抵抗，成功守住惠州。新中國成立，林也立了功勞，把一個完整的惠州，毫髮無損交給新中國人民政府。過後他當選為惠陽縣政協委員，廣東省政協委員，意識到教育的重要，便創辦華僑中學，發展教育事業。由於歷史的原因，1962年被「判刑」，1964年病故。1985年平反。

林振雄的故事和水東東街以及上塘街下塘街的許多房子一樣，充滿清楚明晰的滄桑痕跡。邊走邊看那些基本保留原來風格的老屋，分明全都是大戶人家，然而，我們經過時，單是外觀那破落殘舊的不堪程度，叫人沒進去近觀也唏噓不已。

緩緩地走，慢慢拍照，把尚未修整好的老屋老舖趕緊留在影相裏。聽B說政府正在重新修復衰敗的老街區，這固然是喜訊，卻也叫人擔心，一旦修好，會不會和其他地方



的老村落、舊城、古鎮那樣，將原來的風貌、古蹟和民居一概淹沒在仿古建築和喧囂的人聲裏？是否需要制定法令，勿讓經濟效益至上的商業化，輕而易舉擊退了韻味別致的本土特色。若老街承載的那些優美雅致的古舊記憶，被悅耳動聽的「重修」摧毀得一絲不存的話，老街區是否還值得遠方遊客千里迢迢，花時費神到此一遊呢？

拍照的人往往容易忘記時間，面對記錄歷史文化的景點，遠方來客想在細節處尋回更多被時間蕩漾的昔日風物。突然發現B老師不見了。L說他到前邊探點去，「我們現在過去找他吧。」當時我不知道前面要去的水東院子之重要，我以為那裏不過就是一個喝咖啡的館子。

這一趟惠州行之前我先飛廈門，自香港飛往廈門航班上，觀賞的影片叫《明月幾時有》，沒費時間閱讀電影內容介紹，因為導演是許鞍華。

影片從一位老兵鄭家彬（梁家輝演）的回憶開始。說的是1940年香港淪陷時期，當時身在香港的抗日文化人茅盾、鄒韜奮、夏衍等陷於生命危機，一群仁人志士，在亂世中置自己的生命於不顧，將這群文化名人安全轉移到內陸的故事。

不知為何，抗日的電影永遠叫華人流淚。那是全球華人胸口的痛。中國抗日時期，東南亞國家尚未獨立，當地華人身份都還是中國人，都有一顆中國心。有人熱血沸騰立刻回國參與抗戰，回不了國的人，在海外拚命奔波籌款捐錢。文史的記錄如下：「馬來亞華人發動賑款支持中國抗戰，其中南洋華



惠州有舊事



僑賑總會最有組織領導，它根據各地區人數和經濟狀況確定月捐數目，在新加坡召集南洋僑領開會時，認定新加坡月捐國幣40萬元，馬來西亞認定月捐國幣130餘萬元。」「新加坡華人領袖陳嘉庚也創辦《南洋商報》，大力主張國內全面抵抗，『七七』之後更是每天大篇幅報道抗戰新聞，激勵海外華人出錢出力支援中國抗日。從抗戰爆發到星馬淪陷前的4年多時間裏，『南僑總會』以義捐、認購國民政府戰爭公債、向國內親友寄僑匯、捐贈藥品、募集衣物等形式，為中國籌款達54億國幣之多，佔全世界華人賑款的2/3以上，當時4萬5千國幣就可購軍機一架，這些巨款填補了國內近半數的戰爭開支。」

面對飛機椅子背後小小的影幕淚流時，沒想到自己居然真的來到故事裏的其中一個重要現場。水東院子外的鐵花大門，裏邊的木門，全都閉得緊緊的。院子外頭兩隻大象雕像揚着鼻子守護在左右兩邊。這其中定有什麼故事，一般的中國房子，大門兩邊不是石獅子就是貔貅。院裏的樹，沒花沒葉，看不出是什麼樹種，只有光禿禿的粗幹細枝仰往天空伸展。周邊靜悄悄，一地枯枝落葉，似乎大家都和我一樣，並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。

我們從另外一個門口進去。這棟單家獨院的兩層半建築，是惠州最早的歐式房子，帶著濃厚民國風的青磚牆上貼着大字的「水東」和小字的「院子」，入門半圓頂頗有歐陸風，木框的玻璃門打開半邊，拍照時看見青磚牆上有個牌子，原來這地方舊名叫「東湖旅店」。

為喝咖啡而來，但我久久走不到咖啡桌邊，貼在水東院子進門處牆上的兩張說明，把飛機上的電影和這棟老旅店連接起來。電影裏那些通過好多捨生忘死的無名英雄（著名的有廖承志和喬冠華）從香港救過來的

·朵拉

馬來西亞華人作家、畫家

麻鷹·松樹·花崗石階

□陳德錦



那年我走了，卻不是揮揮衣袖般灑脫。

雲彩我帶不走，卻帶走幾片記憶。那年，有人從街外回來，說海邊飛來一隻大鷹。這鷹翅展十尺，上下高低飛翔。我沒有跑到海邊去看，也沒有更大的好奇。因為不相信傳言，我沒有問人何以南方會出現大鷹，不是那年北方特別寒冷，要飛來南方小城過冬？心裏悵悵的是，那時為何悶在家裏，不像那些在海邊閒逛的人，「時矯首而遐觀」，就發現一隻大鷹在藍天下滑翔？以動物學角度來說，它的體形是滑了，不過也為這寂寞小城平添一點熱鬧。

對於氣候和生態，我沒有多少認識，且別說猛禽的類別。家裏沒有多少畫報或藏書，書裏也很少鳥類的圖譜。海邊出現大鷹，可能因為淺灘上有龍蝦或彈塗魚之類的食物。然而，龍蝦和彈塗魚常見，鷹隼卻不常見。

四十多年前，還沒有橋樑連貫南面的離島，要到海闊天空的地方，就得乘渡輪到最南面的海灘。渡輪碼頭偏遠，航班又稀疏。船身窄小，走得慢，二三漚航程要花大半個小時完成。

乘搭較大的遠航渡輪，在船舷看海是另一番滋味。這些渡輪能離開「鹹淡水交界」，開到碧綠寬闊的海面上，總有三數海鷗被船尾的泡沫吸引，貼水低飛。是司空見慣的海鷗，不是剛猛勇鷗的海鷗。見慣了，有時就回到船裏睡覺。

但有一次，我獨自坐夜航的船，艙裏的行李擠得腳插不下，便把下床位讓給一

個挑着重擔、回鄉過年的男乘客。還記得他說：「踏在行李上，不打擊！我排隊等了三個鐘頭才買到這票子，可是只有上格床位，我爬不上。」我也討厭上下攀爬，就跑到外邊。這時，暗藍的暮色已把海和岸籠罩在一起，回頭只見幾點燈火微弱地亮起，也不能讓人辨認是在哪個島哪座山上。

航程三小時多，在床上讀一本書，倦了，不經意睡着。船過了大海，彷彿左右搖擺着，向窗外望去，遠遠一點光在高處閃動，這光很快又暗下來，不久又再放亮，一束光線向高空拋射出去，繞着一個同心圓不斷旋轉，循環往復。

只有一個地方能發放這一束光線：松山的燈塔。這越夜越亮的光給人熟悉感和安全感。一句話，在昏邊又似在耳邊：「回來了。嗯，又回來了。」

感受奇怪而又真實。這燈塔曾造訪過幾次，向東面走上山的路，走一道斜斜的石砌小路，便見一幢白色圓柱型建築，塔身開了幾口小窗，塔頂安放有夜間導航的照射燈。這裏是最高點，小城在腳下，安靜如同隔世。早上的風景雖美，但到底不過是風景，沒有使我說出「回來了」的衝動。

許多年後，我也許會仿效哲學家海德格爾說：「讓一切回到澄明的處所。讓燈塔成為燈塔……」但那時，很卑賤地，那熟悉感和安全感來自這晃動不定、旋轉往復的光束。在船上，我能嗅到飯香，聽到鞭炮聲，地面的石頭在腳下蠢蠢欲動，像迎送我熱熱的腳步。

叫作「松山」的山上真有松樹嗎？眼底所見都是榕樹，長長的鬚鬚從樹上垂下來，伸手也可以抓住。可是，假如山上沒

松樹，就是名不副實。眼前遍是綠樹，卻不見識到真正的松樹，實在使人悵然。就像老家附近的「木橋街」，從街頭走到街尾，並沒有木橋之類的東西。那時候，即使聖誕節時可在室內樹立一棵柏樹，也會發覺此地無松。

松是常綠樹，是一種象徵崇高久遠的文化符號。也許很多年前，我們不喜歡外國人把街名、地名洋化，有意拿這個通俗的名字來抗衡。松山，是許多本地人常常遠足登高的地點。

因為松樹，我想起林教授。林教授曾在廣州大學圖書館任職，南來以後在中學教書，舊學根底很好。小時到他家裏串門兒，剛見到林教授，他架着眼鏡，瘦瘦的身子很快就躲進書堆裏。林教授寫過一些地理考證文章，但當時我連基本的地理知識也不能掌握，不可能問及此事。松山上據說只有幾棵馬尾松，當然，我沒見過一棵，更沒有檢拾過深褐色的松果。假使發現了馬尾松或濕地松，我必定會「撫孤松而盤桓」，等松果落下來，在上面噴些粉末，用作節日的擺設裝飾，就像聖誕賀片上看見的那樣。

林教授沒有跟我談學問，然而，學校裏也沒有什麼能挑起我的學習興趣，只有學校花園例外。花園裏有一個操場，園裏有芒果樹、楊桃樹，有一棵枝幹歪斜的羊蹄甲，此外便是架架和一條長二十米的跑道。在跑道的盡頭，有一列寬五米約二十級的石階。最高的石階旁邊有一個入口，通往課室走道，下課後我們可以經這裏進出。石階一邊有西式的石欄和石礮，優雅如置身中世紀庭園，其形制與著名的大教堂遺址前的石階相像。有時，石階就充當看台，同學坐在一起，高高在上，觀看運

動會上的健兒跳繩、跑步、跳鞍馬。

我們的校長年事已高，他能作曲，很多曲子在音樂課上由同學唱出來。他常常穿起西裝表演，不過也是校訓和引用聖經。戰後他與妻子南來，管理這所學校的大小事務，每年都召集同學到禮拜堂，讓我們登上台階，接受那代表一點點榮譽的畢業證書。

校方在本地沒開辦中學，最後一年，我不打算升讀本地的學校，因此也就不太顧念這所學校。後來幾年，偶然走過花園，看見年紀還小、穿着白衫白褲的學生在那列石階前玩耍，總勾起一點記憶。愛哭或愛笑的女孩（她們日後有其他哭和笑的原因），孔武有力、比我高出一個頭的寄宿男生（他們日後生活飄泊得多），還有換了一個又一個、但沒有教懂我素描的美術老師——因此我得自學自畫，放棄了又拿起來嘗試。

說來奇怪，我認識的人裏，即使年紀老邁，也說不出他們對這小城的特殊情感聯繫。那年代，由一個小區搬到另一個小區（或叫堂區，堂是天主教教堂），已是大事。居於南區的人與落戶北區的人不相往來，更不成為鄰里，鄰里中又不是同一個家族的鄉親。舊宅雖然寬宏，但家主已去，後人陸續遷離，環境改善便淡忘前塵。新宅蓋得更高，住戶也是互不相識，難以守望相助。去年的風災，使街巷變成澤國，全城人惶急救災之際，那久未出現的同舟之情反而漸漸流露出來。要不然，當今個人主義延續下去，就不可能形成很深和很廣的共同記憶。

那告訴我大鷹飛近海邊的人，當過女校工，獨身，終老於小城。愛考據的林教授身後，家人將他一部分藏書捐給大學。

至於我們的老校長，退休後由另一位老師繼任。學校後來也停辦了，停辦後沒留下多少文獻。我曾詢問教育局，職員查了一下檔案，回答說資料不存。在我可見的校史上也不見他的名字。他作的歌曲也沒有多少人再唱。

凡是生命，都有變異，都有盡頭。他們都離世多年。他們的黃金歲月也是艱難的歲月，即使晚景清明，也轉眼即逝。飛逝，但依然完整。而我，活到耳順之年，也快將回老家檢拾舊物。那地方沒有傳家之寶，但有一套家人時時提及的西式茶具。這套茶具釉上傳統民俗圖案，琴棋書畫俱有，更在杯底印了朱紅色的、看來不似真實的「大清乾隆年製」的字樣。不知道二三十年前是否有優雅的西式茶具出口國外，究竟它走的海路、陸路，或是漫長的絲路？我看重的不是它的物質價值。我看重的是它的工藝和精神，兩種文化的匯聚和共融。

為冷淡的記憶添些助燃的柴枝，我會把茶具留下來，像鷹飛穹蒼，像燈塔的餘光、松濤，以及石階上飄過的身影和人聲，生涯的雪泥上或會多留下一些印痕。

·陳德錦

香港詩人，作家

